

Gaige Kaifang Yilai Renminribao Sannong Yicheng Shezhi Yanjiu

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日报》 “三农”议程设置研究

夏雨禾 著

新华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 “三农”议程设置研究

夏雨禾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夏雨禾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8

(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5011—8443—9

I. 改… II. 夏… III. ①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研究—1979～2006②农业经济—研究—中国③农村经济—研究—中国④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G219.23 F32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980 号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

作 者：夏雨禾

责任编辑：池 平

装帧设计：晓 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443—9

定 价：21.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89580863

总序

方汉奇

新闻学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德国，传播学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都源于西方。这和近代的新闻传播事业肇始于西方，是相一致的。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报刊、广播、电视的高度普及，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高度开发，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内容也不断深化，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相交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带有一定边缘性质的学科。

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和本世纪的世纪之交。传播学的研究萌芽于 40 年代初，逐步开展于 80 年代以后。从 1918 年徐宝璜著的《新闻学》一书公开出版到现在，两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半个世纪到 80 年左右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源于西方，但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一点，在新闻学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传播学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以引进为主的时期以后，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近年来，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稍稍晚于西方，但是发展的速度很快。改革开放后的这二十来年，进步尤为明显。整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园地上，充满了花气氤氲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象。从 1998 年起，在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制定的学科目录中，新闻传播学也已被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则被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不断地缩短；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正在不断地扩大；新闻传播学在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类中，已经逐渐地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在庞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队伍中，拥有新闻学和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开始培养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起始于1983年，到现在已有15年以上的历史，培养出来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累计近50人。目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在高等学校和全国性的科研机构中，按照二级学科设立的，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博士点，已有6个之多，在校或在院攻读学位的博士生近30人。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新闻传播院系，加入设立博士点的行列。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学子和在职的新闻工作者，加入在读博士生的行列。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赴国外攻读新闻传播学方面学位的博士生，学成归国后，在教学科研和业务岗位上工作，他们也同样属于这个群体。

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是：整体的素质和整体的水平较高，有较全面的本学科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前沿的最新情况，掌握系统的相对先进的科研方法，掌握现代化的信息科学手段，能较娴熟地驾驭一至两种外语，能及时地了解国外的科研信息和进行必要的交流。他们的科研成果，包括他们攻读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都经之营之，下了很大的工夫，在本学科领域内，或填补空白，或立论新颖，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撰写过程中，他们很有可能从导师那里得到过指点，但爬梳剔抉，探骊得珠，主要的工夫，还是自己下的。

在所研究的个别问题的开掘上，博士生所达到的深度，超过他们的导师，乃是古今中外的通例。由于主客观的条件不同，投入和努力的程度不同，博士生们的学位论文的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较为一般，但多数都是他们所涉及的那个学术领域内的、众多研究成果中的精品。

新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收入的就是这类精品。它的出版，既展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工作的成果，也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和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新闻传播工作者，提供了一批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高档次的读物。这对推动新闻传播工作的发展，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繁荣，是大有好处的。

1999年3月15日于北京林园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体现了独特性的学理探讨

丁柏铨

“三农”问题极端重要，这似乎是无须多加论证的；对“三农”问题予以重视、加以强调，理所当然。原因很简单：农民，居全国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物质生活水平偏低，精神生活内容匮乏）；农村，是农民休养生息的主要空间；农业，是相当一部分农民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又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由此而合成的“三农”问题，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对“三农”问题，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若干年份每年的一号文件都针对“三农”问题而发就是明证之一；而近几年来，专家学者对此也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屡有力作问世，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学者们研究“三农”问题，较多的是依托自己的学科背景，呈现各自不同的研究特色。这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已不在少数。学者们选取某个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等）的视角，进行探讨、开掘，以期有异于他人的独特发现。对于“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对政策文本和文件精神的诠释、解读，而应该直面“三农”问题现实，通过各种途径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富

于学理性的探讨，并提出具有新意的见解，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学术高度和学术水平。摆在我面前的夏雨禾的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以下简称《三农》），采用的是多学科（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相交叉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对研究课题和内容进行观照、思索。它力求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当是有其独特之处的。

二

夏雨禾是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他在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经有过在高等学校从事行政工作的经历。他早有攻读博士学位的夙愿。不知是看重哪一点，他选我为导师。由此，就注定了他必须在学习中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需要从理论到方法修读社会学方面的一系列课程，阅读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以及除此而外的诸多其他学科的大量书籍。我要求他所写的学位论文，从论题选择、理论构架到研究方法、语言表述，体现新闻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和融合。夏雨禾曾经为选题难觅而久久焦虑、深深痛苦，也曾经因原选题受到有关老师、学兄学姐的善意质疑而中途易辙。经过长时间的思忖，他最后锁定了“三农”问题，从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的内容分析切入，进行课题研究。应该说，这一选题是颇具挑战性的。时间的跨度大，样本的数量大，获取资料的难度大，于他而言不啻三大障碍。然而，他“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潜心搜寻资料、研究写作，历时近一年，完成了初稿。在此基础上，又反复进行修改，数易其稿，终成现在这样的格局。

我始终认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应当具有一定的新意和相当的学术含量，即使研究的是现实问题；也应体现出从学理的高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阐释和驾驭的能力。夏雨禾所研究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三农”报道。但他没有停留于一般地描述或梳理这类报道，说明一些不说就已经明了或说了仍然不明了的道理。他所阐明的道理，以具有说服力的一系列统计数据为坚实基础，做到了言而有据；他所使用的数据，经分析、解读而呈现出了丰富、深刻的含义。

三

为使研究得以深入，夏雨禾将对 28 年中《人民日报》“三农”报道所作的定量分析，纳入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之中。他借鉴议程设置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特定的媒介内容进行的合乎规范的分析，以求揭示和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三农”报道议程设置的总体特征。在对《人民日报》的“三农”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的基础之上，进而探讨各时段媒介议程与当时政府议程、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关系，探讨媒介议程设置的固有特点和内在规律。显而易见，这比仅仅对《人民日报》的“三农”报道进行单纯的描述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深度。

为使研究得以深入，夏雨禾还以史为鉴，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内涵进行历史考察和对比分析，从而使课题研究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底蕴。在该著中，作者既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议程、议题的分布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体现出宏观研究的开阔视野和学术高度；同时又透过该报所作“三农”报道，对政府议程和媒介议程的变化情况加以历时性的考察，在此基础上，较为充分、较为透彻地揭示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议程设置变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准确地勾勒出了纵向发展的轨迹，从而体现出历史的厚重感。

四

专著《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有如下鲜明特色——

第一，关注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此从学理上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

博士学位论文涉足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而缺失学术的应有品格，无疑是不可取的。难能可贵的是，研究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又体现比较高的学术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设置研究》大致就是如此。它兼具学术价值和实际价值。我以为，这是值得提倡的。事实上，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发挥新闻传媒的特殊作用，经由它们来影响社会公众舆论，形成相应的舆论氛围并进而凝合成某种推动力。由此，围绕着“三农”问题，研究新闻传媒的议程设置及其作为，研究新闻传媒议程、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研究新闻传媒在“三农”报道问题上的议程轨迹、流变及其动因，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许多的话题，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上有所作为。而夏雨禾在研究过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分析理论中有关内容的借鉴，则帮助他深化了对论题所作的学理思考，也使他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功力。

第二，充分体现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

夏雨禾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其一体现在另辟蹊径地选取独特的研究视角上。研究“三农”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取某些角度，或因前人多有涉猎且成果颇丰，后来者难以超越；或不易拓展研究空间和获得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视角的选取本身就存在着优劣高下之分。夏雨禾选取的研究视角与众不同。他以《人民日报》的“三农”报道折射媒介议程、透视政

府议程，以对“三农”报道所作的内容分析和以议程设置理论对此所作的论析，体现出如下良苦用心和实际努力：（1）将触角伸向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广阔空间。（2）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连接和贯通。（3）围绕现有论题，既进行纵向的考察，勾勒议程流变的轨迹，探析其背后的动因；又进行横向考察，对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进行对比分析。

夏雨禾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努力，其二体现在著作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鲜见解上。他提出了如下颇有新意的观点：经济发展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负面作用产生倍增效应；《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中存在着议题、议程偏颇，议程偏颇并不仅仅限于报道主题的层面，还存在于消息来源、新闻来源、报道地域、报道倾向和报道模式等多个层面之中；议程偏颇并非大众媒介单纯为强化舆论引导有意而为之的结果，它同样也是新闻传媒新闻材料选择与建构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所导致的产物，对于加强舆论引导来说，它更有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要提高新闻传媒议程设置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既要保持议程和议题的活力，又要确保议程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发挥新闻传媒议程设置的导向作用，既要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又要充当政府议程的“先行者”。

第三，实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夏雨禾在对《人民日报》“三农”报道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该报总体议程为参照变量，通过样本的外部形式特征如“三农”相关报道的报道频数、所在版面、报道篇幅等，与样本所在报纸的相应变量进行对比分析，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的变化情况，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演变轨迹作进一步学理考察。就《人民日报》“三农”报道的议程设置进行如此大规模样本的内容分析，这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不多见，不妨理解为我国当今议程设置研究的一次创新尝试，理解为内容分析法在议程设置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

实践。这样一种研究，既有很大难度，同时也很必要。该著对《人民日报》“三农”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并重的策略。在对“三农”议程的研究中，以定量的内容分析法为主；在涉及新闻报道的议题、主题分析等方面的内容时，将大量采用定性研究的手段，为能从统计学的角度获得更为有力的结论，结合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值得赞许的是：在本项研究中，定量分析被自然和合理地纳入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是融合式的结合，而不是生拉硬扯式的捏合。两者互相依存，并且因结合而相得益彰。

第四，个案研究和附录为本著增加了分量。

我深深感到，在本著中，个案研究不是附庸，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著作中所作的理论阐述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印证和深化作者作出的理论阐述，本身就颇有学理色彩。而该著的附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政策一览》，完全可以视作著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并不是现成的相关文本的目录索引和简单罗列，而是作者在广为搜集的基础上精心整理而成的，同样是作者精力和智力的结晶。

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该著也难免存在不足。除作者已经意识到的研究未涉及公众议程这一层面、《人民日报》作为媒介个案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等问题之外，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在进行定性研究时，还很少涉及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段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各自的作用力和所形成的合力的综合分析。因此，某些论析不免显得捉襟见肘。至于其他不足，恕不在此一一列举。不过，瑕不掩瑜，该著不失为一部达到了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

期望夏雨禾自此以后，不断有新的力作推出。

是为序。

目 录

总序	方汉奇(1)
体现了独特性的学理探讨	丁柏铨(4)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缘起	(1)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3)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7)
1.4 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中西方议程设置研究的进路	(14)
2.1 西方议程设置研究:历史和现实	(15)
2.1.1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起源与动力	(15)
2.1.2 议程设置研究的重大转型	(17)
2.2 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内地的“本土化”进程	(22)
2.2.1 10年来内地学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回顾	(22)
2.2.2 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25)
第三章 内容分析程序及研究设计	(35)
3.1 相关问题的说明及抽样设计	(36)
3.1.1 关于调查对象的说明	(36)
3.1.2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版面沿革	(39)

3.1.3 抽样设计及分析单位的选定	(41)
3.1.4 关于“三农”相关报道的界定	(42)
3.2 内容分析的框架及类目建构	(47)
3.2.1 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的确立	(47)
3.2.2 分析类目的建立及编码	(59)
3.2.3 研究思路	(60)
第四章《人民日报》“三农”议程及议题分布的总体分析	(66)
4.1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三农”议程的发展演变	(67)
4.1.1 报道频数分析	(67)
4.1.2 报道的版面位置分析	(70)
4.1.3 报道篇幅分析	(72)
4.1.4 研究小结	(74)
4.2 《人民日报》“三农”议题的分布与变化	(78)
4.2.1 议题对象分析	(78)
4.2.2 议题范畴分析	(81)
4.2.3 样本中议题内容的构成及变化——基于议题 对象与议题范畴的交叉分析	(83)
4.2.4 研究小结	(92)
第五章“三农”相关报道的主题构成与变迁分析	(99)
5.1 主题构成分析:对“三农”相关报道主题构成的考察	(100)
5.1.1 各议题内容单元的主题构成情况	(100)
5.1.2 研究小结	(112)
5.2 “三农”相关报道重要主题的变迁分析	(117)
5.2.1 “三农”相关报道重要主题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117)
5.2.2 研究小结	(137)

第六章 “三农”议程偏颇:对属性特征的系统分析及个案研究	(149)
6.1 “三农”议程偏颇:对议程属性特征的系统性分析
研究	(150)
6.1.1 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的特征	(150)
6.1.2 新闻材料的地域特征	(156)
6.1.3 新闻报道的倾向特征	(158)
6.1.4 新闻报道的模式特征	(160)
6.1.5 研究小结	(161)
6.2 农村人物形象的建构——“三农”议题偏颇的个案研究	(163)
6.2.1 样本分布情况	(164)
6.2.2 农村人物的生理形象	(166)
6.2.3 农村人物的阶层形象	(168)
6.2.4 农村人物的政治形象	(172)
6.2.5 农村人物的地域形象	(173)
6.2.6 农村人物的事迹形象	(174)
6.2.7 研究小结	(177)
第七章 结语	(181)
7.1 媒介议程:结构互动的产物	(182)
7.1.1 相对性的媒介议程	(182)
7.1.2 媒介议程变化的内部影响结构	(186)
7.1.3 媒介议程和议题变化的外部影响结构	(189)
7.1.4 多重影响结构中媒介现实的建构策略	(191)
7.2 体制偏颇:“三农”问题的一个解析路径	(195)
7.2.1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取向及演变轨迹	(195)
7.2.2 经济发展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负面作用的倍增效应	(203)

7.3 大众媒介与“三农”：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个特殊视角	(214)
7.3.1 主流媒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议程设置	(214)
7.3.2 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220)
附录1 内容分析示例	(227)
附录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政策一览	(265)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缘起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在农村初步形成，这对于长期以来被体制枷锁紧紧束缚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不久后，以家庭联产、统分结合为特征的经营制度也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实施，点燃了广大农民积蓄已久生产激情。在这两方面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农业和农村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良好的发展形势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便出现了“拐点”，农产品买难卖难、打白条、农民负担加重等现象开始在农村出现，那些曾经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城乡分割、以农促工的制度安排，运转失调的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等等，又纷纷卷土重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成长的制度基础也趋于弱化。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农村发展再次陷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犹如古希腊西西弗斯神